

高水平开放下的税收治理： 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

赵春明 钟晓欢 班元浩

【摘要】扩大进口是对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但由此产生的竞争效应可能会影响企业避税动机,进而侵蚀国家税基。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依托进口关税调整冲击识别了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行为间的因果关联。研究发现:日渐激烈的进口竞争会显著加剧企业避税程度,原因在于进口竞争挤出本土企业利润,凸显落后企业的竞争劣势,迫使其通过避税进行代偿或维持生存。进口竞争加剧下的企业避税并非偶然性的短期现象,主要源自避税资本市场溢价效应的强化性反馈。当进口竞争持续加剧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减税降费有助于提升企业纳税遵从,但后者发挥的是输血而非造血功能。本文丰富了企业避税外部动因的相关研究,从纳税视角深化了对中国扩大进口下贸易利得的辩证理解,为协同推进税收治理和高水平开放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词】进口竞争;企业避税;税收公平;贸易利得

【作者简介】赵春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100875),E-mail:cmzhao@bnu.edu.cn;钟晓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100875),E-mail:xhuanzhong@163.com;班元浩(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100875),E-mail:banyuanhao@163.com。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京),2024.6.36~6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JL01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消失的利润,即国家税收与实质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的脱节(Zucman,2015)。随着税收征管效率不断提高,虽然企业逃税行为得到一定遏制,但跨国利润转移、关联交易、账面操纵等形式的避税案件仍层出不穷^①,侵蚀主权国家税基。据Tørsløv et al.(2023)估算,2015年全球仅跨国利润转移形式的避税便高达6160亿美元,约占税前利润总额的40%。企业避税是各国政府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21年,中国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强调应加大对逃避税活动的监督检查力度,并制定反避税政策。反避税作为中国税务部门的重要关注问题,从企业避税视角探寻消失的利润成为亟须研究的时代命题。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贸易与非贸易壁

垒日渐高筑。但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为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力量。此外,中国步入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期,深化自由化改革亟须创造良好的内部竞争生态。主动削减关税、扩大最终品进口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推进外贸平衡发展和跨越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在积极扩大进口背景下,中国企业“备考答卷”,可能出现“小动作”,尤其是当企业置身激烈的进口竞争环境时,可能做出偏离政策初衷的行为决策——加剧避税程度,账面收入远低于真实业绩,致使原本属于政府的利润留存到企业内部。面对进口竞争的外部性,部分利润在企业的不良税收筹划中消失。

随着进口在中国外贸政策制定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强化和进口关税持续削减,进口产品大量涌入,本

土企业市场份额和既得利润被迫挤出(余森杰和智琨,2016;李春顶等,2021),由此导致的财务紧张迫使企业通过避税进行代偿。同时,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凸显了部分本土企业竞争劣势,令其面临退出市场的“达尔文选择”过程(杨岚等,2023)。在避税惩罚成本可承受的区间内,企业基于增加税收现金流的预期,广泛开展避税以期缓解财务紧张或扭转不利竞争地位。与前述现实和政策背景密切相关但尚未得到充分考察的重要问题是:中国扩大进口引致的进口竞争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避税,其内在传导机制是什么?在差异化的内外部条件下有何异质表现?这一影响在不同阶段如何动态调整?在进口持续扩大背景下如何构建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的运行机制与政策体系?

在国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上述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是实现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中国税制情境下,企业作为主要纳税主体,在进口竞争下企业避税大幅增加不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有违税收公平,甚至干扰贸易自由化政策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其次,辩证审视进口竞争的微观层面消极影响,并形成妥善应对方案,有助于根据中国市场主体的复杂反馈效应适时调整扩大进口方向与落实细节,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最后,企业面对进口竞争做出的税务筹划行为是自然的应激反应,也是形成良性市场竞争生态、促进行业转型升级的副产品,厘清其中的传导机制和差异化适应条件,有助于提高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和精准锚定产业政策目标对象、提高治理效率。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有3支:进口竞争的微观经济效应、企业避税动因及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纳税遵从。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学者开始探究进口自由化包括进口竞争的微观经济效应,本文主要关注其企业财务和生产方面的作用。现有研究广泛认同,进口竞争加剧了本土市场竞争(Brandt et al.,2012),挤出本土企业销售市场和利润空间(余森杰和智琨,2016;李春顶等,2021),即“熊

彼特效应”。从进口竞争与企业生产率的联系看,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对进口竞争存在差异化反应。一方面,低生产率企业对进口竞争的反应更加敏感,当进口竞争加剧时,低生产率企业产品更易被替代,破产风险更大(Melitz and Ottaviano,2008;Bloom et al.,2016)。杨岚等(2023)发现在进口竞争冲击下,低生产率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的可能性更大,而高生产率企业存在竞争优势,市场份额下降和被淘汰的风险相对较小。另一方面,Hashmi(2013)与Hombert and Matray(2018)发现增加研发投入有助于本土企业逃避竞争,扭转进口竞争的负向影响。Liu et al.(2021)与诸竹君和王芳(2022)认为当进口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可能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生产率抵消进口竞争的不利冲击。既有文献凸显了根据企业财务和生产率的差异考察进口竞争微观经济效应的必要性。聚焦于企业避税动因的既有研究则更多地从微观视角展开,广泛证实了财务压力和经营风险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激励作用(刘行和赵晓阳,2019;魏志华和夏太彪,2020),以及企业规模、市场战略对避税的异质性影响(Lisowsky,2010)。虽然不乏从税收征管(范子英和赵仁杰,2020)和税收优惠(赵仁杰和周小昶,2022)等宏观视角切入的研究,但鲜有学者将进口竞争的经济效应拓展至企业避税领域。

此外,探究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实质上可从市场竞争环境改变对企业财务操纵行为的外溢效应中得到启示。值得注意的是,进口竞争与本土市场竞争相比更具外生性,企业通过预期和关联势力调整行为的调整空间有限,当进口竞争环境改变时,企业的反应更加复杂。现有关于市场竞争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研究有所欠缺且尚未达成共识。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市场竞争具有威胁和掠夺效应。Cai and Liu(2009)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验证激烈市场竞争会诱发企业少报利润的行为。牛煜皓和张文婷(2023)发现,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强化了垄断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提高其经营风险的同时降低盈利能力,增加了其税收规避的意愿。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市场竞争具有外部治理效应,可增加管理层懈怠成本,强化管理者维护声誉的动机,促使其减少避税等短视行为(姜付秀等,2009;伊志宏等,

2010)。与本文最相关的文献是 Chen et al. (2022) 的研究,他们从守成国视角探究全球化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会显著降低美国制造业企业纳税水平。既有研究为本文理解和分析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奠定了文献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对于两者的讨论大多是孤立的,既未将进口竞争纳入企业避税动因的分析框架,在识别进口竞争的经济效应时,又忽略了对企业避税的潜在影响。同时,上述研究均未将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深入公司治理领域,更鲜有从新兴大国视角出发考察进口竞争影响税收治理的文献,这不仅会夸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的社会福利效应,还不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有失市场公平。

基于此,本文聚焦现有研究的交叉点,以中国进口关税削减为切入点,从进口竞争角度剖析企业避税程度加剧致使国家利润消失的市场原因,利用 2000-2020 年上市公司与进口关税的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进口关税下降是近年来企业避税程度加剧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微观机制看,进口竞争下企业财务紧张和竞争劣势的凸显是企业避税加剧的作用渠道,即竞争挤出和竞争激励效应。从纵向维度看,进口竞争下的企业避税呈现黏性特征,并非偶然性的短期现象,避税的资本市场溢价效应是可能原因之一,增加企业现金流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不能一劳永逸,但后者对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为持久。从横向维度看,宏观层面,在税收治理严格和高度市场化的区域,进口竞争的企业避税加剧效应消弭,微观层面则因企业规模、数字资源配置、国际市场战略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进口竞争对企业税务筹划的负面影响,从外部溢出和内部输血的二维视角进一步检验国家政策有效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缓解进口竞争的微观负面效应,但后者更多发挥的是输血功能而非造血功能。

综上所述,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中国情境下识别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机制,有助于揭示中国扩大进口政策和共同富裕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进口竞争在不同内外部环境下对企业避税影响的差异研究,以及对竞

争挤出和竞争激励影响机制与中国现实状况交互影响的剖析,提出扩大进口和税收公平并行的普惠发展模式,为统筹兼顾市场效率与分配公平、提升社会福利寻求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撑,也为企业应对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提供了经验参考。第二,从贸易开放视角拓展企业避税动因的研究内涵。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从微观层面揭示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缺乏对宏观贸易政策与企业税务筹划互动关系的理解。本文揭示了进口竞争通过挤出本土企业利润和凸显竞争劣势加剧企业避税的微观传导机制,既为企业避税泛化致使国家利润消失的现象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又为未来中国税务治理实践提供有效参考。基于对进口竞争加剧场景下企业避税行为动态调整的考察和对其具有惯性的原因挖掘,对于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及政府优化配置审计资源,锚定政策对象,提升治理能力具有启示作用。第三,将企业税务筹划纳入贸易自由化经济后果的分析框架,从企业避税角度进一步丰富文献对中国扩大进口进程中贸易利得的辩证理解。对进口竞争影响企业避税的微观机制的剖析,从企业税收筹划视角深化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再认识。从正向外部溢出和选择性外部输血视角探索扩大进口优化税收治理的有效路径,为政府协同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税收机关效率,突破税收征管能力的瓶颈制约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典型事实和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经验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微观机制和动态调整分析;第六部分是异质影响与机制协同检验;第七部分是政策有效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结论和相关建议。

二、典型事实与理论假说

(一) 典型事实

大量研究提供了进口竞争对企业业绩和生产率积极影响的经验证据(钱学锋等,2016;余森杰和智琨,2016;李春顶等,2021),然而在进口竞争下企业业绩增长并未伴随其纳税额等比增加,利润消失之谜引起关注。图 1 展示了 2000-2020 年中国进口关税、进口总额与企业避税程度的趋势。从中可知,2000-2020 年中国进口关税逐渐削减的同时进口规模不断扩大,表明本土企业面临的进口竞争环境日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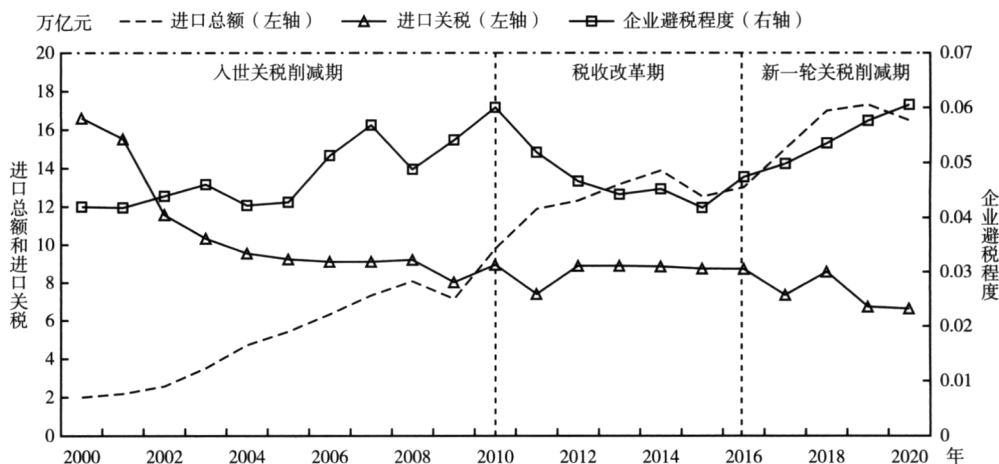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进口和企业避税程度变化情况（2000-2020年）

数据来源:进口总额数据来自海关总署,进口关税和企业避税程度的计算方法详见后文研究设计部分。

激烈。企业避税程度均值虽在2008和2011年出现两个拐点^②,但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即样本期内的进口竞争加剧伴随着企业避税程度增加。分阶段看,2002年,中国开始落实入世条款中的关税减免政策,进口关税大幅下降,进口规模攀升,本土企业面临的进口竞争程度加剧,避税水平随之上升。2005年,中国实现大部分产品降税承诺,并在此后几年保持稳定降税步伐,直至2010年,入世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企业避税水平也相应达到峰值。2010-2016年,中国关税进入稳定期,增值税改革和金税三期逐步试点推广,企业税负负担降低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使避税成本提高,因此该时期企业避税程度下降。2016-2020年,中国税收环境逐渐平稳。但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逐步缩减、取消,外资企业开始大规模撤离中国,为稳定和扩大双边贸易,建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中国开始新一轮进口关税减免,随之而来的就是2016-2020年的新一轮企业避税程度上升。

部分研究证据也表明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或存在潜在因果关系。第一,面临更大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往往财务披露实践较弱(Healy et al., 2014; Huang et al., 2017),可能是由于公司业绩走低或存在会计操纵行为。第二,进口竞争会改变企业管理者行为。例如,Dasgupta et al. (2018)指出,受到强烈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倾向于雇佣更有能力的高管,而Koester et al. (2017)认为能力较强的高管的税务管理

策略更加激进。第三,Shleifer (2004)指出,在竞争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发生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会提高。同时,Slemrod (2004)发现,由于竞争加剧而导致利润绩效下降的公司可能会诉诸违规行为,节余或攫取现金进行投资。第四,由于贸易自由化而降低的进口关税提高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水平(Brandt et al., 2017)。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征管体制不如发达国家完善,因此外部竞争诱导的避税可能更加普遍。与此对应,Cagé and Gadenne (2018)的研究表明,1970年以来的贸易自由化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的下降。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新新贸易理论指出进口开放对国内竞争具有促进作用,并非所有企业均能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受益。其中,Melitz (2003)在企业异质性和垄断竞争的基本假设下,验证贸易自由化促使市场份额和利润向高生产率企业靠近,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综合上述经典贸易理论,扩大进口加剧本土市场的竞争,在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市场份额和经营利润进行再配置,边际成本高昂和生产率低下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在此基础上,本文产生一个猜测:当进口竞争挤出本土企业的经营利润,致使其陷入财务紧张局面,或当落后企业面临进口竞争引致的市场退出风险时,是否会显著提升其对税收惩罚的承受能力,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避税通道。具体的,进口关税削减降低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固定成本,产品价格随之降低,对国内市场形成同质竞争(Amiti and Konings, 2007),本土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

额被迫挤出(余森杰和智琨,2016;李春顶等,2021),对税后现金流的需求明显提升。价格竞争处于劣势的企业濒临淘汰(Krugman,1980),此时,具有短期生存目标的企业风险偏好增强,出于规避风险的“蓄水池”动机,可能冒险采取各种激进措施增加现金流,以求降低成本提升价格竞争力。相比于提高生产率、扩大规模、改变营销策略等方式,避税更易实现、操作灵活、负面影响较小(Shleifer,2004),因此成为企业在面临进口竞争冲击时代偿挤出利润的可行策略。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假说1。

假说1:进口关税削减加剧进口竞争,提升企业避税动机。

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进口竞争加剧挤占本土企业市场份额和利润,由此导致的财务紧张迫使企业通过避税进行代偿。二是企业在进口行业中处于竞争劣势地位,濒临市场淘汰,避税是企业退出前或扭转不利局面的风险尝试。反向逻辑是,在进口竞争加剧的场景下,财务资源充裕和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不会显著提升避税动机。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的微观机制。

一是竞争挤出机制。进口竞争挤出本土企业市场份额与利润空间,生存与竞争压力的激增加剧企业财务拮据(Chen et al.,2022),资金需求随之增加。企业融资渠道包括外源和内源两种。在进口竞争冲击严峻的情况下,企业外源融资难度陡增。原因在于进口竞争改变了企业经营环境(钱学锋等,2016),外源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加强,道德风险相应提高,出于对资本溢价损失的担忧,投资者信心及资本性和债务性融资水平降低。进口竞争对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冲击通常更加显著,同时也令其面临更为不利的外部融资条件。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有赖于其利润水平、资产规模和投资者预期等因素,但进口竞争的加剧弱化了上述因素的正向实现,致使内源融资同样难度攀升。在此情境下,出于避税可增加税后现金流的预期,企业更倾向于用避税缓解财务拮据(魏志华和夏太彪,2020)。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当行业进口竞争加剧时,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提升会降低避税倾向,但其无法保证企业能够在激烈进口竞争中持续生存或获得垄断利润,因而

仅是短期内缓解财务压力、降低避税动机的方式之一。从长期看,企业“节流增效”和“保有存量”对缓解进口竞争的避税加剧效应作用有限。

二是竞争激励机制。低生产率企业产品可替代性强,进口竞争凸显了低生产率企业的竞争劣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濒临淘汰(杨岚等,2023),此时企业风险偏好显著增强,维持道德行为的成本上升,倾向于采取激进避税策略以获取持续生存的现金流,或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扭转竞争劣势(Cai and Liu,2009)。这同样意味着,当落后企业在进口竞争的激励之下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Melitz,2003),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边际成本,或是采用差异化产品策略扭转竞争劣势时,可缓解进口竞争负面效应,避税动机相应减弱。同时,较高的生产效率具有“自然保值”作用,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进口竞争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实现持续的经营稳定性(余森杰和智琨,2016),即在“马太效应”作用下,强者愈强的累积优势促使高生产率企业逐渐从“更强”走向“恒强”,从内生动力视角持续性地抑制扩大进口下企业避税加剧这一现象。从长期看,竞争激励效应在企业和社会层面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与仅追求内部现金流增加相比,企业更应将提升竞争力作为应对进口竞争的首要目标。隐含的抽象逻辑为:企业“开源增收”和“创造增量”才是抑制进口竞争的避税加剧效应的长久之计。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假说2。

假说2:进口竞争存在竞争挤出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即缓解财务紧张和提升竞争优势将有效缓解进口竞争衍生的企业避税倾向加剧。竞争挤出机制主要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竞争激励机制则更具长期有效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为2000-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保证度量标准统一,本文主要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名义所得税率数据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进口关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地方财政税收收入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衡量行业进口竞争程度采取的是WITS的HS6位码进口关税数据,参照Brandt et al.(2017)的方法

将产品关税数据匹配至 CIC4 位码行业层面,再根据样本期内国民经济代码调整和企业主营业务变更将其匹配至 CIC2 位码行业层面进行简单平均,选取制造业进行考察。由于各行业能否匹配到进口关税数据具有随机性,为进一步验证样本不存在自选择问题,对进口关税缺失与未缺失的企业避税指标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样本并无显著差异,故该样本具有较强代表性。

为提高研究样本数据有效性,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剔除 ST、* ST 类上市公司;剔除关键变量存在异常的样本(如企业实际税率小于 0 或大于 1 的样本);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将样本限制在总部位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排除少于 3 家公司的行业样本。最终,本文得到 26 个制造业行业中的 2281 个企业,共 19741 个观测值。

(二) 变量定义

1. 进口关税水平。准确识别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有赖于构造相对外生的解释变量。我们借鉴赵春明等(2020)的研究,以产品进口关税水平衡量行业层面进口竞争程度(ITF_{jt}),具体计算公式为:

$$ITF_{jt} = \frac{\sum_{s \in j} n_{st} \times \text{tariff}_{st}}{\sum_{s \in j} n_{st}} \quad (1)$$

其中, n_{st} 代表 t 年产品 s 的税目数, tariff_{st} 代表产品 s 在 t 年的实际适用进口关税税率, j 为CIC4位码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将进口值作为权重计算行业关税会赋予进口密集型产品更大权重,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根据 Amiti and Konings(2007)的研究,行业层面进口产品平均关税可视作该行业最终产出关税,有别于中间投入关税,可以更好地捕捉进口竞争效应(Lie and Yang, 2023)。

但进口最终品关税削减并不完全等同于进口竞争,尤其是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仍会限制进口规模,然而本文依旧选用进口关税衡量进口扩大的原因在于:第一,进口关税调整为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决策,比由国内需求推动的进口渗透更具外生性。关税在文献中已被广泛用于衡量行业层面贸易自由化(Brandt et al., 2017)。第二,关税反映国家贸易政策趋向,企业根据对未来进口增长的预期调整行为,而非进口渗透的实际变化。第三,进口渗透忽略了关税引发的国内价格变化,观察到的进口渗透已包含

了企业预期未来进口增长的相关抵消行动,将低估日益增加的竞争。然而,使用进口关税可能会忽略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如果关税削减幅度较小的行业具有较大进口弹性,估计将出现向下偏误。因此,本文同时选用进口渗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2. 企业避税程度。企业避税大多通过盈余管理方式,借助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等条件,造成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差异。本文与多数文献一致,采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的会税差异(DDBTD_{it})刻画企业避税程度,即(2)式中的 $\mu_i + \theta_{it}$ 。大量学者发现这一指标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汤晓建等, 2021; 李建发等, 2023),而且 Chan et al. (2010)的研究证明其可以更好地捕捉中国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

$$BTD_{it} = \beta_1 TACC_{it} + \mu_i + \theta_{it} \quad (2)$$

其中, BTD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度的会计-税收差异, $TACC_{it}$ 为总应计利润, μ_i 为企业 i 在样本期内的残差均值, θ_{it} 为 t 年度残差与残差均值 μ_i 的偏离度。

(三) 计量模型

为检验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DDBTD_{ijt} = \alpha_0 + \alpha_1 ITF_{jt} + \alpha_2 \mathbf{X}_{ijt} + \alpha_3 \mathbf{Y}_{jt} + \delta_i + \varphi_j + \gamma_{pt} + \epsilon_{ijt} \quad (3)$$

其中, $DDBTD_{ij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避税程度, ITF_{jt} 为 t 年企业 i 所在行业 j 的平均进口关税, $\mathbf{X}_{ijt}$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mathbf{Y}_{jt}$ 为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δ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φ_j 为行业固定效应,为避免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税收洼地、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的现象及地区层面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如税收执法力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干扰回归结果,我们同时控制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γ_{pt} ^③, ϵ_{ijt} 为扰动项。

此外,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资本收入比(CD)、企业规模(SIZE)、上市时长(AGE)、财务报告质量(FRQ)、内控质量(ICQ)、负债水平(LEV)、外部审计质量(EA)、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同时引入行业层面控制变量。首先,外资大规模涌入或挤占本土企业市场份额,增加其避税倾向,故本文参照毛其淋(2020)的做法控制行业外资规模(FOE)。其次,国内竞争同样会加剧企业避税(Cai and Liu, 2009),为衡量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的净效应,我们控制了国内竞争程度(CR_5)^④。最后,控制行业层

面财务指标,包括行业营业总收入的对数(INDOR)、行业账面市值比(INDAM)、行业总负债的对数(INDLEV)、行业长期借款的对数(INDLTL)以及行业息税前利润的对数(INDEBIT),并采用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聚类标准误缓解模型中潜在的自相关问题^⑤。

(四)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其中进口关税ITF的均值为8.5260,标准差为3.6535,说明不同行业间关税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横截面差异。企业避税程度DDBTD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大于0,表明样本期内中国大部分上市企业均存在避税行为,这与多数研究数据结论一致。其余变量的特征与分布与现有文献接近。结合图1可以看出,样本期内中国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展示出较大时间差异,提高了检验的统计有效性。进口关税与进口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进口关税削减的同时进口规模扩大,证明进口关税指标可以很好地拟合中国进口竞争加剧的现实^⑥。

四、经验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为进口关税削减对企业避税影响的回归结

果。第(1)列控制企业、行业和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进口关税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避税程度。第(2)列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基本保持稳定,是进口关税与企业特征相关性较弱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影响的随机性。第(3)列进一步加入行业层面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稍有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排除了可预见的其他行业冲击影响企业避税的替代性解释。从经济意义上看,在同等条件下,最终品进口关税每下降1%,企业避税程度则平均增加0.0022,相当于自身水平的4.39%^⑦,验证了研究假说1。此外,为进一步探究在中国进口关税保持不变的场景下,企业避税程度处于何种水平?本文参照Pierce and Schott(2016)的做法,以基准回归结果对反事实结果进行粗略估算^⑧。数据表明,如果保持样本期间内中国进口关税不变,2020年中国整体制造业企业避税程度将降低0.02个百分点。换言之,2000-2020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平均进口关税从16.51%降至6.52%导致企业避税程度平均上升31%,该影响远非可忽略不计。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TF	19741	8.5260	3.6535	1.3464	7.6569	40.9706
DDBTD	19741	0.0501	0.0617	-0.7191	0.0444	0.5290
CD	19741	2.1660	2.4287	0.1314	1.7483	96.775
SIZE	19741	21.3224	1.3736	16.0758	21.1855	27.5128
AGE	19741	1.9915	0.7491	0	2.0794	3.4012
FRQ	19741	-0.0049	0.2121	-4.2642	0.0060	3.4215
ICQ	19741	6.3497	0.9628	0	6.5128	6.9085
LEV	19741	20.9146	1.4720	15.4562	20.8130	27.1357
EA	19741	0.0496	0.2172	0	0	1
ROA	19741	0.0323	0.0938	-3.9944	0.0337	0.7859
FOE	19741	4.7758	0.9332	1.7537	4.8762	6.7201
CR_5	19741	0.4683	0.1737	0.1636	0.4611	0.9422
INDOR	19741	26.3660	1.2479	22.5754	26.4743	28.5071
INDAM	19741	0.9244	0.4654	0.1232	0.8801	4.2926
INDLEV	19741	26.0817	1.2858	22.0734	26.3362	28.2205
INDEBIT	19741	23.5828	2.8109	0	24.0290	25.8379
INDLTL	19741	23.7540	1.5940	0	24.0420	26.5998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DDBTD	(1)	(2)	(3)
ITF	-0.0024*** (-3.3005)	-0.0024*** (-4.1357)	-0.0022*** (-4.3054)
企业、行业 and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9643	19643	19643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 R ²	0.4515	0.6525	0.6565

说明: *、**、*** 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 值,标准误差在会计师事务所层面聚类调整,后表同。

(二) 内生性问题处理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是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关系研究有限的原因之一,如政府的行业保护偏好、扶持力度等混淆因素会同时影响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的税务筹划。针对识别策略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缓解。

1. 剔除存在政企关联的样本。现实中存在政策吹风的可能或深受进口冲击的行业游说政府以寻求关税庇护,继而产生内生性。范子英和田彬彬(2016)就曾发现政治关联度与企业避税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企业高管曾经或当前在政府、党委纪委、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检察院和法院任职更有可能进行政策吹风,因此剔除企业高管可能存在政治关联的样本。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2. 工具变量。本文参考钱学锋等(2016)和赵春明等(2020)的研究,采用以下工具变量捕捉进口竞争的外生变化。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历史(1999 年)行业进口关税税率。根据 Brandt et al. (2017)的研究,中国加入 WTO 不仅承诺降低关税平均水平,还将致力于缩小行业间关税差异,因此期初关税水平越高,后期关税削减程度越高,即满足相关性条件。历史关税不影响当期个别企业的选择,即满足外生性条件^⑨。由于历史进口关税率为截面数据,我们参考孙传旺等(2019)的做法,将其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引入模型。第二个工具变量为印度进口关税水平,采用该工具变量的理由是基于“向邻

居学习”的政策模式,一国政府倾向于向邻国学习,市场导向选择与邻国开放程度具有同步性。中国和印度同为金砖国家,在开放政策上具有一定趋同性,即满足相关性条件。同时,印度进口关税难以左右中国企业的避税选择^⑩,即满足外生性条件。本文同样可能存在“不良控制变量”问题,即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受企业避税的反向影响,或者是进口关税下降的结果变量,导致估计系数产生偏差。因此,将控制变量替换为各自滞后 1 期。2SLS 的回归结果依旧表明进口竞争是企业避税活动增加的诱因。

3. 准自然实验。纵览中国新时代扩大进口的工作进程,2018 年中国先后对汽车、药品、日用消费品和部分工业品等自主降低最惠国税率,为近十年来首次大范围下调消费品进口关税。消费品关税的下降大幅降低了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固定成本,提高了国内制造业的进口竞争程度(秦若冰和马弘,2023),可视为进口竞争影响企业避税的准自然实验。由此,我们将 2018 年消费品进口关税下降视为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中国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⑪。回归设定如下:

$$DDBTD_{ijt} = \alpha_4 + \alpha_5 Treat \times Post + \alpha_6 X_{ijt} + \alpha_7 Y_{jt} + \delta_i + \varphi_j + \gamma_{pt} + \epsilon_{ijt}$$

(4)

其中,Treat 为受到 2018 年消费品关税下调冲击的行业^⑫,受到冲击取值为 1,否则为 0。Post 在 2018 年之后取值为 1,否则为 0。回归结果显示,受到 2018 年消费品关税下调冲击的企业避税程度显著上升。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图 1 中出现拐点的特殊时期、更换聚类标准误、考虑中间品关税的影响以及考虑进口竞争的行业再分配效应等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⑬。

五、微观机制与动态调整逻辑

(一) 竞争挤出机制与竞争激励机制检验

1. 竞争挤出机制的检验。由于市场资源是有限的,当进口竞争的外部性增强时,企业原有市场份额和经营利润被挤出,企业面临财务紧张局面,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或实施降价策略,改善生产与进口品竞争,便倾向于避税以增加税后现金流。企业可支配现金流是企业财务紧张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

借鉴叶康涛和刘行(2014)的研究,采用内部现金流充裕度(ICA)衡量企业可支配现金流水平,将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相乘并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后加入(3)式,回归结果见表3第(1)和(2)列。从中可知,在加入ITF×ICA交互项后,ITF的系数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同时ITF×ICA的回归系数也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越低,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的加剧效应越大。换言之,可支配现金流的提升可有效缓解进口竞争的企业避税加剧效应。在中国大部分企业中,两权分离的制度和金字塔式管理结构强化了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企业流动性普遍不高。在持续扩大进口背景下,国外供应商瓜分本土企业“蛋糕”,财务拮据的企业试图以避税“保有存量”,而内部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则具有更为灵活的策略操作空间,可降价与进口产品竞争,从而减少进口竞争负面冲击。这也意味着企业“节流增效”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避税动机提升。

表3 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
基于竞争挤出和竞争激励视角的分析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DDBTD	竞争挤出机制		竞争激励机制	
ITF	-0.0036*** (-5.252)	-0.0030*** (-5.900)	-0.0122*** (-4.617)	-0.0083*** (-4.208)
ICA	-0.0172 (-1.052)	-0.0121 (-1.422)		
ICA×ITF	0.0066*** (4.137)	0.0043*** (5.197)		
TFP			0.0178*** (6.010)	0.0075 (1.464)
TFP×ITF			0.0012*** (4.047)	0.0008*** (3.50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9643	19643	18772	18772
调整后的R ²	0.5272	0.6844	0.4847	0.6629

2. 竞争激励机制的检验。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竞争凸显落后企业的竞争劣势,放大了其经营风险,避税成为企业退出前或扭转不利局面的风险尝试。当进口关税削减,物美价廉的外国产品大规模涌入

国内市场时,部分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本土企业濒临淘汰,可能倾向于通过避税应对风险或逃避竞争。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产出规模、要素利用效率、技术水平等综合性因素,更能刻画本土企业相对竞争力。因此,我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TFP)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代理变量以检验竞争激励机制,将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相乘并进行去中心化后加入(3)式。在表3第(3)和(4)列中,ITF系数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ITF×TFP的回归系数也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低,进口竞争的避税加剧效应越大。换言之,技术创新的“排头兵”或企业“开源增收”可有效抑制进口竞争的避税加剧效应。同时,从经济意义上看,ITF×ICA每上升1个标准差,企业避税程度相对于正常水平下降38.95%,ITF×TFP每上升1个标准差,企业避税程度则下降48.36%,后者系数远大于前者,说明竞争激励机制的反向调节作用大于竞争挤出机制,从国家治税角度出发,企业“开源增收”优于“节流增效”,本文假说2得到证实,即为通过提升企业现金流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扩大进口背景下的企业纳税遵从提供了经验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进口竞争具有“鲶鱼效应”,即倒逼低端过剩产能退出或者转型,扩大优质产品有效供给,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有研究也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行业生产率提升(余森杰和智琨,2016;诸竹君和王芳,2022)。那么,按照本文逻辑,进口竞争引发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后果理应缓解进口竞争的企业避税加剧效应,为何平均效应仍是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这背后是否存在二元悖论,即进口竞争倒逼产业升级与良性纳税遵从两者不可兼得?本文认为不是这样的。首先,进口竞争的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应为行业层面整体效果,即企业生产率相对于封闭经济出现显著增益,原因在于在市场自发筛选下,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逐渐被淘汰,而前沿企业的竞争实力则进一步提升,这是纵向维度上的结果。然而本文竞争激励效应论证的是市场上高生产率企业能有效应对进口竞争压力,低生产率企业则出于竞争压力增加避税动机,这主要是从横向维度出发的。其次,两者效应的发挥应存在时间差,即扩大进口引发的竞争先是

促使低生产率企业采用避税方式增加税后现金流,随着倒逼效应的逐渐显现,行业整体生产率得以提升,企业避税动机有所减弱。最后,本文结论与贸易自由化后企业生产率普遍提高的文献共识并不矛盾,反而进一步从避税视角验证了新贸易理论中贸易自由化对“明星企业”的“倍增效应”,即进口竞争具有强化高生产率企业优势的趋向,令其不必通过避税方式逃避或对抗进口竞争。

(二)进口竞争下的企业避税: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策略

进口竞争下企业加剧避税究竟是短期行为还是长期策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有助于识别和理解导致企业避税加剧的结构性因素,为税收政策制定和监管提供更准确的参考。本文采用企业未来1—6期的避税程度对其所在行业当期进口关税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当期进口关税下降将显著加剧未来1—5期的企业避税程度,且呈倒U型趋势,前3期进口竞争的避税加剧效应逐渐增强,后2期效应则逐渐减弱,在未来第6期影响效应消失^⑩。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处于进口竞争下的企业避税具有黏性,并非偶然性的短期现象,同时也佐证了前文猜测,随着进口竞争倒逼效应显现和本土企业对进口竞争的适应性增强,企业避税意愿逐渐下降。

整合上述已证实的逻辑并进一步延伸,在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具有黏性的前提下,竞争挤出机制和激励机制是否依旧成立?我们利用企业未来1—6期的避税程度机制分析中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随着考察期的拉长,ITF×ICA和ITF×TFP交互项系数逐渐降低,前者在第3期,后者在第5期之后不再显著。这表明,一方面,在进口关税削减的后期,竞争激励机制是导致进口竞争持续加剧企业避税的主因。另一方面,上述两种机制的反向调节均没有一劳永逸的效果,即如果只在受到进口冲击的当期提升内部流动性和生产率,无法对企业避税起到长期抑制作用。但相比于缓解财务紧张程度,提升市场竞争力显然可以更持久地抑制进口竞争的企业避税加剧效应,本文假说2得到证实。进一步地,当企业在首期受到削减进口关税冲击后,如果未来每期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内部现金充裕度,是否可以规避企业避税行为具有黏性的问题?为此,

本文采用未来1—6期的企业避税程度分别对未来1—6期的ICA和TFP与当期ITF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持续地改善财务和改进生产才能抑制企业避税^⑪,而这无疑是对企业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具有长期影响的原因,即在受到预期之外的进口冲击后,大部分企业不具有持续提升内部现金流和改善生产的“毅力”。

(三)进口竞争下企业长期避税的一个动因:资本溢价效应

本文认为本土企业缺乏“毅力”并不是进口竞争下避税行为具有持续性的主因,理应存在某种隐性收益激励企业持续避税的这一风险行为。综合现有理论和文献,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企业避税行为具有溢价效应,即避税可以显著改善企业资本市场表现。正如Li and Zhan(2019)指出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推动管理者寻求包括税收策略在内的方式增加企业市场价值。为此,我们采用企业股票年度收益率衡量其资本市场表现,并分两步验证上述猜测。首先用股票年度收益率(StockReturn)对企业避税程度进行回归^⑫,发现随着企业避税程度的增加,其股票年度收益率呈向好趋势。然后我们将进口关税作为调节变量,用企业股票年度收益率对进口关税与企业避税程度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发现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⑬,说明当进口关税下调时,将显著强化企业避税筹划对其股票收益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意味着在利益导向的裹挟与进口竞争叠加的影响之下,企业避税正在以一种被歪曲检视的方式生成并不断固化。进口竞争在加剧企业避税的同时,也在资本市场上产生涟漪效应,即存在这样一种逻辑链条: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程度增加→资本市场正向反馈→企业避税行为持续。后两环的成立诠释了在进口竞争加剧背景下企业避税行为具有惯性的缘由。企业避税方式与投资者错误识别的共同作用,会导致风险行为获得溢价反馈,长此以往的循环将使企业选择和资金流向被反复重塑,加剧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⑭。

六、异质影响与机制协同检验

(一)外部治理环境

1. 税收征管差异。中国地区间税收竞争和税收

征管效率差异问题由来已久,时有发达地区“藏富于民”、落后地区征“过头税”的现象。避税是企业与外部税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税收征管作为外部监管机制之一,有望产生治理效应和成本效应。一方面,促进“应收尽收”,有效遏制企业偷漏税行为(范子英和赵仁杰,2020);另一方面,促进“应享尽享”,征税机关的监督稽查倒逼企业强化内部治理降低避税动机(孙鲲鹏和杨凡,2023)。借鉴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的做法,本文通过比较实际税收比率与潜在税收比率的偏离度刻画税收征管强度(TE),将地区税收征管力度按当年中位数进行高低分组后进行再回归。表4第(1)和(2)列显示,在税收征管宽松城市,进口竞争仍会显著加剧企业避税,而在税收征管严格的城市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说明当地严格的税收征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进口竞争的微观负面效应,表现为进口竞争并未显著影响企业避税。

2. 市场化水平差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未来,深入市场化改革将与扩大进口的长期现实并行,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背景。但中国不同地区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存在发展步调不一致、水平不协调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企业纳税外部环境的非均衡性。本文预计在高度市场化地区,进口竞争的企业避税加剧效应应骤降甚至消弭,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在高度市场化地区,政策透明度高,营商环境优化,企业负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小,产权和投资收益亦有良好的保护屏障(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第二,市场体制完善意味着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和治理方面的作用更加有效,收费和摊派等企

业税外负担不高,有助于增加企业税收认同,降低违规避税倾向(刘畅和张景华,2019)。第三,区域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现存企业抗压性更强,进口关税下降引致的外国竞争冲击对其边际效应减弱。本文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代理市场化程度(Market),并按当年中位数进行高低分组后再回归。如表4第(3)和(4)列所示,对高度市场化地区而言,削减进口关税并未加剧企业避税程度,反之则基准回归结果依旧成立,说明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具有补偿效应,即税收征管或市场活力不足时,进口竞争的微观负面效应显现。这同样意味着,未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进口竞争的微观负面效应有望得到解决。

进一步地,在税收征管宽松和市场化水平有待提升地区,竞争挤出和竞争激励机制的反向调节仍然成立^⑨。在正外部性缺位时,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内部现金流和生产效率的内部提升有效“补位”,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避税激励。扩大进口应与严格外部治理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有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纠正企业不合理的逐利行为,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红利。

(二)内部个体特征

1. 企业规模差异。中国融资市场长期存在“规模偏向”问题,即大型企业信贷资源易得性高,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困扰。这将从两种渠道弱化小企业对抗进口竞争的能力:(1)小企业通过外源融资增加内部现金流难度攀升;(2)小企业通过降本提效扭转进口竞争劣势的外部资金支持减弱。本文以总资产表征企业规模(Size),描述性统计发现大企业避税程度均值高于小企业,与Lisowsky(2010)的结论一

表4 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基于外部治理环境差异的分析

被解释变量: DDBTD	(1) 强税收征管	(2) 弱税收征管	(3) 市场化水平高	(4) 市场化水平低
ITF	-0.0011 (-1.5841)	-0.0020*** (-3.3153)	-0.0004 (-0.8784)	-0.0022*** (-3.43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731	10773	9039	10333
调整后的 R ²	0.6586	0.6727	0.6276	0.7284
组间系数差异	3.93***		74.06***	

说明:组间系数差异为 Chow 检验估计结果,后表同。

开拓新市场获得营收增长,不失为企业的良策。本文从市场战略差异出发对此进行考察。一方面,在中国持续扩大进口背景下,企业积极开展出口等国际化业务,拓展市场空间以缓解进口竞争压力,竞争挤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企业避税激励降低。另一方面,新新贸易理论的选择效应表明,出口企业生产率较高,竞争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企业避税程度下降。为此,本文以是否具有海外收入作为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代理变量(Foreign)进行高低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第(5)和(6)列。在践行国际化战略的子样本组中,削减进口关税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但在尚未实行国际化战略的子样本组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负且大于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进口竞争对销售市场局限于国内的企业避税产生显著加剧作用。这不仅佐证了竞争挤出机制,也为企业主动应对进口竞争的挤出效应提供潜在破解之道。

七、政策有效性分析

(一)正向外部溢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

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且部分税收筹划活动具有资本市场溢价效应,强化了企业避税行为的黏性特征。在进口竞争加剧背景下,避税对于企业似乎是一种“何乐而不为”的策略。事实上,企业避税选择为惩罚成本与风险收益博弈的均衡结果,当避税惩罚成本提高时,企业更倾向遵从纳税。因此,在进口扩大背景下抑制企业避税动机的一种有效政策情景可设定为:该政策可以监测企业税务筹划动向,预期惩罚成本上升,避税动机相应减弱。信息技术有助于税务部门监督和追踪企业避税。2009年税务总局印发《金税三期工程管理办法》,旨在“以数治税”的指导思想下,建设覆盖各级国地税、所有税种、所有环节的全国性税收信息系统。从2013年开始,金税三期正式开启国地税局试点,2016年完成全国推广。金税三期是中国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关键一步,有助于改善涉税信息的获取和共享,增加税收稽查的准确、有效性,降低企业逃税可能性(张克中等,2020),能够有效刻画企业避税惩罚成本上升。本文参照范润和孙雪娇(2022)的做法,以金税三期试点的外生政策冲击设计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税收征管信息化抑制进口竞争避税加剧效应的

政策效果。首先,定义金税三期政策实施地点变量TREAT,企业注册地位于金税三期试点城市则TREAT取值为1,否则为0,定义实施时间变量POST,实施金税三期当年及以后POST取值为1,否则为0;其次,将2016年及后续年度样本全部删除^②,为保证样本企业在政策前后均有观测值,剔除各城市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上市的样本;最后,将企业避税程度对TREAT和POST的交互项进行回归^③。

表6第(1)列结果显示,试点城市在实施金税三期政策后,当地企业避税程度显著下降^④,说明金税三期能显著增加企业避税惩罚成本,抑制其避税的路径依赖,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从表6第(2)和(3)列可知,金税三期抑制企业避税的结论在进口竞争激烈(进口关税较低)行业的样本组中仍成立,在进口竞争不充分的行业中则不再成立。究其原因,低进口竞争程度行业中的企业避税动机相对较弱,金税三期政策效力空间有限,而深受进口冲击的企业避税程度普遍较高,金税三期政策效果得以显现^⑤。上述结果表明金税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政策,对抑制进口竞争引发的企业避税具有良好的政策效力。

表6 进口竞争背景下:金税三期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有效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DDBTD	(1) DDBTD	(2) 高关税	(3) 低关税
TREAT×POST	-0.0028** (-2.2359)	0.0010 (0.2901)	-0.0057** (-2.50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542	5600	5882
调整后的 R ²	0.6196	0.6068	0.6606

(二)选择性内部输血:减税降费政策

如前所述,提升企业现金流和生产率可以抑制进口竞争的避税加剧效应。囿于生产率提升往往为企业自我选择的结果,而现金流的增加则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2022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缓费并举,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⑥。样本期内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施,作为政府之于企业的转移支

付,有望直接增加企业税后现金流,降低避税动机。在此情景下,本文检验减税降费之于进口竞争避税加剧效应的政策效果。由于减税政策效果会反映在企业实际税负上(张克中等,2020),故我们采用企业实际税负(ETR)(等于缴纳税费与税费返还之差除以营业收入)衡量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其值越低,国家减税降费力度越大,企业内部现金流越充足。

表7第(1)和(2)列是根据ETR年度中位数进行分组后再回归的结果。显而易见,对于国家减税降费力度较低的企业而言,减税降费的抑制效果尚未充分显现,进口竞争仍会加剧企业避税,而在减税降费政策力度较高的企业中,国家财政转移对进口竞争挤出既有利润的企业起到“旱苗得雨”的作用,表现为进口竞争未对企业避税产生显著影响,即针对性的税收倾斜可以缓解进口竞争的负面效应。但是,面对积极扩大进口下进口竞争的常态化和经济下行压力,经营主体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起来”,仅靠减税降费政策给企业输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已经明确减税降费坚持阶段性政策为主,企业作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一旦内部现金再次缺乏,依旧具有通过避税进行代偿的动机。为此,本文在国家减税降费力度较高的样本中,用企业避税的未来1—6期对当期进口关税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第(3)—(6)列所示,在进口关税下降的未来1期内,减税降费政策依旧有效,但从未来第2期开始,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进一步削减关税仍会加剧企业避税。本文的假说2再次从侧面得到验证,即企业“节流增效”或“保有存量”只能在短期内缓解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的加剧作用,以增加企业

现金流水平为导向的减税降费政策仅能发挥输血功能,而非造血功能。未来,如果政府想在进口持续扩大背景下,从根本上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的加剧,仍应致力于设计鼓励企业提升自身生产力的制度安排。同时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虽然近年来减税降费力度持续加大但难以达到预期政策效果的潜在原因,即不断加剧的进口竞争可能通过挤出本土企业利润的方式加剧企业财务紧张程度。

八、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扩大进口不仅是激发世界市场活力、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的关键变量,也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探究进口竞争的微观企业层面经济效应并形成有效的应对之策,关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进方向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税收基础。本文通过对进口关税和上市企业避税趋势进行跨期20年的特征描述和动态追踪,识别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避税的总体和结构性影响,剖析其中的渠道机制与动态调整过程,在此之下验证国家政策有效性。结论如下:首先,单纯削减进口关税会加剧企业避税程度,该影响因外部治理环境和企业内部特征而异,严格税收征管力度、良好市场环境都能显著弱化进口竞争的企业避税加剧作用,企业充分发挥规模优势、优先配置数字资源、拓展国际市场业务可以改变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避税的局面。其次,进口竞争存在竞争挤出和竞争激励效应,即进口竞争通过挤出企业利润和凸显落后企业竞争劣势提升其避税动机,而充裕现金流和较高生产率则会缓解进口竞争的企业避税加剧效应。对于小企业而言,提升生产力是其应对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的最优策略。再次,在进口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企业倾向于避税并

表 7 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性

被解释变量: DBTBD	(1) 高税负	(2) 低税负	(3) 未来 1 期避税	(4) 未来 2 期避税	(5) 未来 3 期避税	(6) 未来 4 期避税
ITF	-0.0022*** (-4.4525)	0.0000 (0.0296)	0.0004 (0.4977)	-0.0031** (-2.3946)	-0.0032*** (-2.6052)	-0.0037*** (-2.87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534	9537	8046	7010	6391	5649
调整后的 R ²	0.7743	0.6637	0.5063	0.4945	0.4794	0.4737

非偶然性的短暂现象,主要原因在于避税具有显著资本市场溢价效应,加剧了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现金流与生产率的缓解作用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企业持续发力应对进口竞争。最后,金税三期和减税降费政策有助于充分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红利,抑制进口竞争引发的企业避税加剧现象,但减税降费政策的长期效果式微,即其能发挥输血功能,而非造血功能。

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在积极扩大进口的同时应加强税收治理,避免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社会整体福利提升效应被企业避税造成的税收下降削弱。贸易和税收政策应联动考虑、协同决策,将审计资源向进口竞争激烈部门倾斜,在限制利润转移的同时,有助于倒逼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开拓新市场等高质量发展方式应对进口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第二,税务机关应因“类”制宜,充分考虑企业差异,实行精准“靶向”稽查,重点监测内部现金缺乏、生产率低、规模较小的企业,有效降低税务代征的效率损失。第三,在积极扩大进口的背景下,协同营造抑制企业避税的“软环境”和“硬措施”,在强化地方税收征管的同时,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支持要素市场发展,推动普惠金融覆盖“最后一公里”。第四,稳步推进金税四期工程,加快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全方位监测企业通过关联交易、阴阳合同、避税天堂转移利润的行为,利用大数据平台对核定征税数据进行修正,提升企业缴税合规性。同时,有针对性、审慎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将企业税务筹划作为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参考指标。第五,本研究表明企业财务紧张和生产落后是进口竞争加剧避税的微观机制。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强化小企业政策扶持融资保障,缓解企业外源融资压力;另一方面,进一步落实企业创新发展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实施数字化转型,扩大经济效益以促进纳税遵从。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企业避税一般指纳税企业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

下,尽可能减少纳税义务的行为,与企业逃税在法律意义上具有显著的差别。但现实中,往往很难界定企业减少纳税义务的行为隶属于合理避税还是非法逃税。本文参照 Dyrengd et al. (2008) 等大多数文献的定义,不对避税的法律类型做严格区分,仅将企业避税定义为广义显性税收相对于法定应纳税额的减少。

②2008 年中国正式实施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全球金融危机和后续出台的“四万亿”政策可能影响企业避税选择,2011 年营改增正式拉开序幕,降低了重复征税现象,有助于抑制企业通过“两本账”逃避税款的行为。此外,2011 年,中国相继出台一揽子结构性减税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税负,降低了企业避税动机。

③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同时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的原因是:本文样本中有不少企业在样本期内更换行业,而剔除这些企业会存在选择性偏差,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对这些企业做进一步的分析。

④本文承认这可能会存在“不良控制变量”的问题,在后文稳健性检验部分尝试对此进行处理。

⑤限于篇幅,关于变量的定义和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层面聚类标准误的原因详见《世界经济》网站(www.jweonline.cn)本文补充材料附表 1。

⑥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设计基于进口关税能很好地代表中国进口竞争加剧。为检验这一点,本文首先计算了进口关税指标 ITF 与进口额的相关程度,发现二者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2339。同时使用进口额对 ITF 指标进行回归,结果极其显著。

⑦经济显著性的计算方式为:(回归系数/Y 均值)×100%,因此,进口关税 ITF 的经济显著性为(-0.0022/0.0501)×100%=-4.39%。

⑧计算公式为: $\overline{DDBDT}_{t,counterfact} = \overline{DDBDT}_t + 0.0022 \times (\overline{ITF}_t - \overline{ITF}_{1999})$

⑨根据前文分析,可能存在政策吹风或者游说政策的企业干扰进口关税,为此,本文同样剔除政企关联度高的样本,然后采用历史关税水平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回归结果依旧显著。同时,由于进口竞争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存在惯性,在剔除 2000 年之前成立的企业后,结果没有较大改变。

⑩一种可能的影响渠道是:印度进口关税下降导致中国企业出口到印度的成本降低,企业销售收入增加,避税动机随之改变。但在控制中国对印度的年度出口量之后,系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由此排除了上述假设的可能性。

⑪为验证 2018 年消费品关税下降冲击的相对外生性,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2018 年以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存在较为显著的平行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企业避税

程度的上升的确是由消费品关税下调导致的。

⑫具体方法如下:先将所有进口产品的 HS 编码与 BEC 编码匹配,区分消费品和消费品/资本品,筛选出中国公布的 2018 年 7 月下调关税的消费品,参照前文的处理程序将下调关税的消费品类目数据匹配至 CIC2 位码行业层面。

⑬限于篇幅,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和稳健性分析详见《世界经济》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录 2-4。

⑭限于篇幅,具体回归结果详见《世界经济》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 5。

⑮限于篇幅,具体回归结果详见《世界经济》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 6 和 7。

⑯用股票年度收益率对企业避税程度进行回归,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选用企业上市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工具变量。第一大股东在公司中拥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对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存在关键影响,特别是企业避税的决策,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企业上市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主要取决于股东自身的决策与股东之间的决议,也有可能按照一些既定模式划分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并无直接联系,满足外生性要求。再次进行 2SLS 回归之后,股票年度收益率与企业避税的关系依旧显著。

⑰限于篇幅,具体回归结果详见《世界经济》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 8。

⑱限于篇幅,关于进口竞争下企业避税资本溢出效应原因的进一步解释详见《世界经济》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录。

⑲为验证机制在分样本回归中是否成立,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在分组回归显著的子样本中分别加入核心解释变量、机制变量及两者的交互项,考察交互项的系数是否显著。如果在加入交互项后,分组回归显著的子样本中交互项系数仍然显著且方向同机制分析中的交互项一致,则判断两个机制在异质样本中成立。例如,本文发现在税收征管宽松城市,进口竞争依旧显著加剧企业避税,则在税收宽松城市的子样本中加入 ITF、ICA 及 ITF×ICA,若 ITF×ICA 的系数仍为正数,则说明竞争挤出机制对税收宽松城市的企业同样成立。限于篇幅,微观机制动态调整的回归结果详见《世界经济》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 9。

⑳限于篇幅,具体回归结果详见《世界经济》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 10。

㉑数据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 2023 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㉒2016 年后金税三期在全国所有省市均已落地,本文初始样本期间涵盖 2016 年及以后的年度,可能导致 2016 年起国家出台的个别政策系统性地影响企业避税,若是其他政策导致了回归结果,即便金税三期对企业避税并没有产生影响,也

可使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异于 0。

㉓由于 TREAT×POST 为省份-年份层面变量,依旧控制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故我们在此部分控制个体、年份、行业与城市固定效应。本文其余部分的固定效应设定仍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㉔为缓解同期实施的营改增改革对企业避税意愿度混杂影响,我们进行以下检验:剔除受营改增政策影响最大的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企业;加入企业实际税负(ETR)变量,控制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结论依然成立。

㉕根据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实施金税三期前,进口竞争较激烈处理组避税程度均值为 0.0503,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后则下降至 0.0387,远低于对照组避税程度均值的 0.0485。

㉖数据来自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01/content_5739491.htm。

参考文献:

[1] 范子英、田彬彬(2016):《政企合谋与企业逃税:来自国税局长异地交流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 4 期。

[2] 范子英、赵仁杰(2020):《财政职权、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经济研究》第 4 期。

[3] 范润、孙雪娇(2022):《减少避税活动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金融评论》第 4 期。

[4] 姜付秀、黄磊、张敏(2009):《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世界经济》第 10 期。

[5] 李春顶、郎永峰、何传添(2021):《中国扩大进口战略的经济效应》,《中国工业经济》第 2 期。

[6] 李建发、袁璐、李文文等(2023):《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税收规避——来自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证据》,《管理世界》第 8 期。

[7] 李雪松、谷琳琳、赵宸宇(2022):《数字化转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中国工业经济》第 10 期。

[8] 刘畅、张景华(2019):《“宽放”“善管”与企业避税》,《财经论丛》第 11 期。

[9] 刘慧龙、吴联生(2014):《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管理世界》第 4 期。

[10] 刘行、赵晓阳(2019):《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经济研究》第 10 期。

[11] 毛其淋(202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经济研究》第 2 期。

[12] 牛煜皓、张文婷(2023):《反垄断与企业避税:压力效应还是治理效应?》,《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 3 期。

[13] 钱学锋、范冬梅、黄汉民(2016):《进口竞争与中国制

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世界经济》第3期。

[14] 秦若冰、马弘(2023):《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效应与福利分析——来自2017-2019年关税改革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第2期。

[15] 孙传旺、罗源、姚昕(2019):《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空气污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8期。

[16] 孙鲲鹏、杨凡(2019):《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作用与企业股价同步性》,《经济学(季刊)》第4期。

[17] 汤晓建、张俊生、林斌(2021):《税收征管规范化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吗?——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第6期。

[18] 魏志华、夏太彪(2020):《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财务压力与企业避税》,《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19]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202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20] 杨岚、张瑞涵、周亚虹(2023):《进口竞争与技术距离》,《经济学(季刊)》第4期。

[21] 叶康涛、刘行(2014):《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金融研究》第9期。

[22] 伊志宏、姜付秀、秦义虎(2010):《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管理世界》第1期。

[23] 余森杰、智琨(2016):《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利润率》,《经济研究》第8期。

[24] 曾亚敏、张俊生(2009):《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管理世界》第3期。

[25] 赵春明、李震、李宏兵(2020):《主动扩大进口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来自最终品关税削减的长期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26] 赵仁杰、周小昶(2022):《区域性税收优惠与企业异地投资的避税效应》,《财贸经济》第11期。

[27] 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2020):《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经济研究》第3期。

[28] 诸竹君、王芳(2022):《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财贸经济》第9期。

[29] Amiti, M. and Koning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5), pp. 1611-1638.

[30] Bloom, N.; Draca, M. and Van Reenen, J.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6, 83(1), pp. 87-117.

[31] Brandt, L. J.; Van, B. and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pp. 339-351.

[32] Brandt, L. J.; Van, B.; Wang, L. and Zhang, Y.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9), pp. 2784-2820.

[33] Cai, H. and Liu Q.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 119(537), pp. 764-795.

[34] Cagé, J. and Gadenne, L. "Tax Revenues and the Fiscal Cos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1792-2006."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8, 70(10), pp. 1-24.

[35] Chan, K. H.; Lin, K. Z. and Mo, P. L. "Will a Departure from Tax-Based Accounting Encourage Tax Noncompliance? Archival Evidence from a Transition Econom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1), pp. 58-73.

[36] Chen, T.; Lin, C. and Shao, X. "Globalization and Corporate Tax Policies: Evidence from Import Competit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22, 68(8), pp. 6145-6162.

[37] Dasgupta, S.; Li, X. and Wang, A. Y.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Shocks, Firm Performance, and Forced CEO Turnover."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8, 31(11), pp. 4187-4231.

[38] Dyreng, S. D.; Hanlon, M. and Maydew, E. L. "Long-Ru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1), pp. 61-82.

[39] Hashmi, A.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Inverted-U Relationship Revisite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 95(5), pp. 1653-1668.

[40] Healy, P.; Serafeim, G.; Srinivasan, S. and Yu, G. "Market Competitio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Persistence in Accounting Profitability around the World."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4, 19(1), pp. 1281-1308.

[41] Hombert, J. and Matray, A. "Can Innovation Help US Manufacturing Firms Escape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China?"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8, 73(5), pp. 2003-2039.

[42] Huang, Y.; Jennings, R. and Yu, Y.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anagerial Disclosure of Earnings Forecasts: Evidence from Import Tariff Rate Reduction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7, 92(3), pp. 185-207.

[43] Koester, A.; Shevlin, T. and Wangerin, D. "The Role of Managerial Ability i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63(10), pp. 3285-3310.

[44]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5(70), pp. 950-959.

[45] Li, S. and Zhan, X. "Product Market Threats and Stock Crash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2019, 65(9), pp. 4011-4031.

[46] Lie, E. and Yang, K. "Import Penetration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3, 36(1), pp. 281-316.

[47] Lisowsky, P. "Seeking Shelter: Empirically Modeling Tax Shelters Using Financial Statement Inform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5), pp. 1693-1720.

[48] Liu, Q.; Lu, R.; Lu, Y. and Luong, T. A. "Import Competi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151(2), pp. 102650.

[49]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2003, 71(6), pp. 1695-1725.

[50] Melitz, M. J. and Ottaviano, G. I. P.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 pp. 295-316.

[51] Pierce, J. R. and Schott, P. K.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7), pp. 1632-1662.

[52] Shleifer, A. "Does Competition Destroy Ethical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2), pp. 414-418.

[53] Slemrod, J. "Cheating Ourselves: The Economics of Tax Eva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21(1), pp. 25-48.

[54] Tørsløv, T.; Wier, L. and Zucman, G. "The Missing Profits of Na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3, 90(3), pp. 1499-1534.

[55] Zucman, G.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p. 63-97.

Tax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High-level Openness: Import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Zhao Chunming Zhong Xiaohuan Ban Yuanhao

Abstract: Expanding imports is essential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owever, the resulting competitive effects may influenc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motives, thereby eroding the national tax base. This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0 to 2020, leverages the impact of import tariff adjustments to ident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creasing import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is occurs because import competition squeezes the profits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highlighting the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 of lagging firms and forcing them to resort to tax avoidance to compensate or survive. The tax avoidance induced by heightened import competition is not a random short-term phenomenon but is driven by the reinforcing feedback of tax avoidance capital market premium effects. When import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intensify, the digital upgrading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taxes and fees can enhanc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though the latter serves as a palliative rather than a curative measure. This study enriches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drivers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de gains under China's import expansion from a tax perspective, providing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tax governance and high-level openness.

Key words: import competiti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ax equity; trade gains